

迈向全球空间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意蕴

左路平

摘 要：在空间正义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被揭蔽并得以出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现实背景就是全球空间正义问题的凸显，彰显了其强烈的问题导向和人类情怀，实现全球空间正义成为其价值诉求和实践指向。当前全球空间不正义状况表现为：在人类虚幻共同体中，资本向全球空间扩张，政治权力也介入到全球空间生产中，全球空间呈现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全球空间中气候问题、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契机，探寻全球空间正义问题的破解之道在于：推动各国的共享发展，改变全球空间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建设制度公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平等参与全球空间治理；以价值观、气候和资源环境方面的共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奠定全球空间正义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空间正义；空间意蕴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9)03-0009-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3.00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倡导构建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和发展方式，也是为解决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空间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现代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现实考量，也是尝试对当前不正义的全球空间格局的改造与修复，其目标指向是塑造新型的、正义的全球空间。

一、理论内涵：空间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交往、人类发展、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理论架构和实践推进有着丰富的空间意蕴。

（一）正义的空间转向与空间正义的时代内涵

空间正义问题首先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者在城市问题研究中，发现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空间隔离、空间剥削和空间不平等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视域实现了由时间向空间的转换。其中，阿尔都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阿尔都塞通过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结构因果性’以及‘多元决定论’思想运用于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的重新理解来对抗传统历史哲学的解读。这种通过结构对抗主体及其历史哲学的方式，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化的主要前奏曲”^[2]。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研究”（14AZD041）

作者简介：左路平，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 合肥 230039）

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阐发，哈维则对资本空间化进行了研究，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詹姆逊则倡导后现代空间理论。其中，大卫·哈维的论述和批判最为详尽和丰富，他运用自身丰富的地理学知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流通和运作的分析逻辑，把对资本流通、循环和增殖的分析推演至空间领域。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将这种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理论分析演绎至全球空间，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空间的不正义状况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哈维以空间正义为基点展开对资本的批判，开发了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批判渠道。……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变化，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3]。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空间正义的实践探索中则显得力不从心，无法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但他们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和关注视域，即维护和实现空间正义。

哈维等人的空间正义理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任平较早地指出：“所谓空间正义，就是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4]。可见，空间正义实质上就是强调公民对于空间资源的平等使用权，注重公民空间权益的保障。曹现强则认为，空间正义包括七个方面的内涵：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空间压迫和剥削的减少；空间边缘化现象的避免；空间权利的保障；空间文化平等性的维护；空间暴力行为的消失；生活空间的环境公正^[5]。总之，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向空间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它首先应当是基于对空间剥削、空间隔离、空间关系不平等、空间资源享用不公等方面现象的批判和取缔，进而强调社会成员在空间资源、空间权益方面的平等享有，强调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公正平等地进行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平等的分配和消费空间权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空间条件。在全球化发展新时代，空间正义问题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的城市化发展，而是延伸至全球空间领域。显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空间正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完成，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鲜明问题指向之一就是当前全球空间的不正义状况，内在地蕴涵着重塑全球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基本主张

近年来，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外交场合的讲话中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最早提出是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倡议道：“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6]。正是基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网络化的广泛普及，地球已然变成“地球村”，各国人民之间空间感和距离感不断缩小，世界人民的联系与合作愈加紧密，相互依赖也不断加深，习近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开辟现实道路，“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内容。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要义。习近平指出：“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8]这种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就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经济。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内涵。即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建立一个共赢互利的共同体，推动各国之间形成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全球价值观的形成。习近平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基础。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旨趣。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剧，恩格斯早就提出警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P99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内含着全人类联合起来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的要求，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

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进而走向生态文明社会。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指向与全球空间正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关于空间思想的论述，但是在一系列相关论述中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空间的形成进行了论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0](P35)}。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全球交往时代的到来，全球空间的图景也因此而逐步形成，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空间的形成引起了剥削、奴役和压迫等不正义行为。在当前时代，全球空间布局的图景已经呈现，全球空间正义问题也不断凸显为时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鲜明的问题指向就是当前不正义的全球空间生产、空间格局、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实现空间正义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指向。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类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人的现实关照，也是对时代问题的现实回应。”^[11]其问题之一，就是全球空间不正义状况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加深。在全球化发展中，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不对等的空间关系，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一方面，把空间生产推向全球，攫取落后国家的空间资源为资本增殖服务；另一方面，把本国的环境污染和工业垃圾转移到落后国家的国境和领地内，造成对其生存空间的损害。基于此，中国倡议构建新型的全球空间格局，打造各国之间平等、合作、互助的空间交往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为当前全球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次，实现全球空间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诉求。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空间呈现出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各民族国家在全球空间发展中存在着空间不平等和空间剥削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这种空间不正义的反拨与修正，尝试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全球空间发展道路，以实现全球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和实践指向，为促进全人类的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问题指向：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空间不正义状况分析

对全球空间不正义状况的分析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空间思想的揭蔽，马克思相关论述中对空间问题的隐喻，是对全球空间发展进行正义批判的基础。

（一）资本的全球空间化发展与扩张

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资本空间化的概念，但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隐喻着对资本在全球空间流动和实现增殖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2](P33)}。在扩大商品市场和实现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下，资本会突破地域的限制，不断在地理空间上涌向全球，把世界纳入自身的体系下，也就是说，资本的本性内在地要求空间扩张以实现自身流通与增殖。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蕴涵两个维度内容：首先，开拓作为资本的物的表现形式的商品的全球销售市场，以全球空间扩张来实现商品消费和再生产。商品首先“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13](P89)}。同时，资本试图克服“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13](P169)}。借助理理扩张以实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的目的，这也是资本空间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其次，全球空间扩张是为了扩大资本的空间流动范围，促进资本的自由流通，进而为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创造条件。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3](P88)}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扩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资本流通的范围，加速资本流通以实现资本增殖，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空间生产来实现资本增殖。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沦为资本逻辑下的生产要素，“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4](P875)}，资本逻辑

渗透于一切可以或可能成为生产要素的事物之中，空间也被纳入其中。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全球范围形成了虚假的共同体，“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5](P571)}。

（二）全球空间生产中政治霸权的介入与再生产

资本不仅要把全球空间变成商品的销售市场，变成实现自身循环的一个阶段，而且还会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向全球，通过持续性的全球空间生产来确立符合资本逻辑要求的全球空间秩序。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12](P247)}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走向世界各国，在全球空间中营建了一种权力的场域，即一种政治权力逻辑借以形成，“资本的全球化对全球社会空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全球社会空间呈现出同质性和断裂性的双重特征，‘同质性’建构了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权力场域，而‘断裂性’则导致了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空间剥夺”^[16]。可见，资本主义不断地推动全球空间生产，在空间生产中确立资本主义的主导生产方式，发达国家还借助塑造“同质化”全球空间的过程，建构了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全球空间格局和政治秩序，国家权力也介入到全球空间的生产中。正如哈维援引阿伦特的话指出的，“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有“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才能“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17](P29)}。资本只有与政治更好地结合，资本家只有在全球空间中谋取政治上的霸权，才能为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流通与循环提供政治保障。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还试图在全球空间范围构建一种垄断权力以维系既有的不平等空间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在既有的全球空间政治秩序和空间格局下，资本主义凭借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逐渐造就了一种全球空间政治不平等的局面，而且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这种不平等的空间政治关系，进而为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扩张和增殖服务。

（三）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化发展不仅造成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和全球空间的政治化发展，而且还在推动全球空间重构中造成了严重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区域剥削更加严重，给世界人民带来新的不平等和压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2]：

首先，全球空间生产布局造就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与依附关系。大卫·哈维认为，在全球空间生产中，“受竞争所驱使，个体资本家总是寻求在这一空间结构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总是被推动着向那些低成本或高利润的位置转移”^{[17](P78)}。显然，这种状况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引起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某些具有区位和资源等各方面优势的地方快速发展，而其他没有这些优势的地方成了空间生产的边缘地带，因此，“某种核心——边缘关系必定会从集中和地理扩张的紧张中诞生”^{[18](P358)}。而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空间关系，中心地区支配和控制着边缘地区，在全球空间中表现为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空间支配和空间统治。其次，资本积累危机的全球空间转移与价值倒流。哈维认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资本盈余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修复”得以补救和延迟，通过空间转移，过剩资本被吸收并得以增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得以延迟。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资本推向全球空间来实现资本的自我修复，把资本积累危机转移到落后国家，这种“时空修复”转移了国内经济危机，但却给落后国家带来灾难，造成这样一幅景象，即穷国愈穷，富国愈富，富者还不断地通过危机的空间转移实现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再次，资本主义征服和控制全球空间，走向新帝国主义。哈维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和霸权阶级联盟会在这些区域内部得以形成，并给这些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带来重大影响”^{[17](P84)}。而这种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的权力逻辑一旦演绎至全球空间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建立起基于资本的权力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的全球空间治理体系，从而走向统治全球空间的新

帝国主义阶段，在霸权统治下的全球空间继续为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服务，以实现资本的不断循环与不停增殖。贫困国家和贫困地区的人们则因此遭受着全球空间生产所带来的剥削和压榨，全球空间不正义依然持续着。

（四）全球空间的生态正义问题与污染转移

随着工业的发展，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问题愈演愈烈，并且蔓延至全球空间领域，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过程中，贫穷落后国家也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全球空间的生态正义问题也不断凸显。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着最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问题，却没有承担相应的生态治理责任，而是让全人类来承担其生态成本和环境污染。如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决定退出《巴黎协定》，这是对美国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一种推卸，“美国于2001年、2017年先后两次退出全球气候政治协议（《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其所留下的全球权力真空与全球经济转型需求也给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中的地区协调、制度安排、公共利益/优先性带来了全新的挑战”^[19]。可见，发达国家是全球空间环境污染、生态问题和气候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但是却拒绝承担相应责任和相关义务，凸显了全球空间的生态正义问题。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污染转移，呈现出新形式的生态殖民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和资金优势，肆意地转移环境污染，“要么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相关产业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在看似平等的贸易往来中，运用其高价的科技产品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态资源，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这种环境污染和生态成本在全球空间的转移，体现了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倾向，贫穷落后国家承担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问题，应有的生态权益被剥夺却无力反抗，全球空间的生态不正义日益凸显。

三、价值诉求：全球空间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内在地蕴涵着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也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应然逻辑。

（一）规制全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任务

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空间生产亦造成了严重的空间剥削和空间不平等，落后国家的人民也因此而遭受资本的奴役和压迫，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污染的空间转移而不断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改变现有的资本逻辑对全球空间生产的主导和控制，建构一种基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时指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1]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一种互惠互利、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无限制的、非正义的发展模式，其目标是在加强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空间的合理流通，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高效流通，进而实现各国在共建和共商中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要求“制定和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资本运行规范，确立资本逻辑运行的合理边界和适度范围，阻止资本逻辑对世界人民的野蛮绑架和操控，防止资本帝国对他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颠覆和霸权”^[21]。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意味着对资本逻辑的规范与限制，保证其在合理的限度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降低乃至消除其负面效应，解决资本逻辑主导下导致的各种空间不正义问题，促进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而其最终走向则是资本逻辑的彻底摒弃，建立人类社会的“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破除全球空间政治中的霸权介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使命

在既有的全球空间生产发展和全球空间格局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着技术和资本方面的优势，建构了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全球空间秩序，一种不平等的全球空间关系得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正是基于对此的认知和批判，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推动全球空间秩序的重构，构建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1]。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的是一种有别于霸权逻辑的新的全球空间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全球空间生产的霸权介入被抛弃，各国之间的交往是基于平等的政治主体身份。对于分歧和争端的具体事件的处理和解决，各国之间完全是平等协商、合作对话的关系。在此种情形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空间生产中利用政治霸权推动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将会被抛弃，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将会被规制，服务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总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世界各国之间将会形成一种主权独立、地位平等的关系，世界的前途与命运是由各国人民共同协商决定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将被多边主义政治所取代，新的全球空间秩序得以建立。

（三）改变全球空间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空间生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呈现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一方面，发达国家自身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而另一方面在贫穷落后国家却呈现出一幅完全相反的破败不堪的发展状况。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造成了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生活不仅要遭受空间剥削和空间压迫，还经历着生态不正义导致的生存空间压缩、生活环境恶劣等生活境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改变全球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推动各国在参与全球空间生产中实现协同、平衡发展，共享发展带来的收益和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开辟的世界现代性发展道路，强调的是在全球化利益相互交融中，各民族国家能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普惠发展，以此来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22]各国的均衡、协调和普惠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现实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改变现有的全球地理不平衡发展状况，促进平等的、协调发展的全球空间格局的重组。中国将通过自身的发展为他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促进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分配和流动，保障各国之间在共商和共建的基础上共享发展的红利和成果，最后形成世界各国之间主体平等、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普遍获利、共赢共享的空间发展格局。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空间发展方式的新的全球空间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区别于旧有的建立在不平等、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人类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成功打破了“现代性唯一”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23]。

四、实践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全球空间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现实路径。

（一）构建利益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空间的地理均衡发展

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5](P286)}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论构想与实践倡议如果不能以利益的共享为基础，就会显得空乏无力，缺少

号召力。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实现各参与国家之间的资源共享，在共商共建中获得切实利益和社会发展，进而推动全球空间的均衡发展。

首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共享平台和互动交往组织，保障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公平参与中实现利益和资源的共享，促进全球地理的均衡发展。既有的全球经济组织，如WTO、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各国的经济平等和利益实现，但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组织存在着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属性，隐性的不公正也大量存在。为此，要着力推进建立以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商共建的全球经济组织和利益共享平台，其中，“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将自身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的创造性实践，是在国家间求取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典范”^[24]。它的建设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互利合作、资源共享和共同发展的机会，各国人民在共商共建中共享发展的成果，沿途各国的优势都可以借助此平台得以发挥，在经济交往中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合作、人才交流和资金互助，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25]。全球空间的共享发展得以形成，全球空间地理均衡发展也逐步实现。其次，加强各国之间相连相通的交通、工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跨空间合理、高效流动，实现各国经济的合作与共享。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建设各国之间相连相通的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在各国之间的高效流动，进而实现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和高效利用，实现各国之间的共享发展。为此，要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保障机制，设立基于各国协商、合作基础上的融资机制和金融机构，为各国基于空间发展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各国的空间联系，缩短区域隔离，拉近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实现各国之间地理层面的互联互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空间条件和基础保障。最后，加强对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促进全球区域平衡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1]推进全球空间地理均衡、协调、普惠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目标，中国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有义务和责任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更需要推动发达国家达成共识，共同参与救济和资助那些贫穷国家，为贫困地区提供无条件的资金和技术帮助，推进世界各国的协调、均衡发展，才能最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

（二）建设制度公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平等参与全球空间治理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空间生产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控制和技术优势等，把垄断权力和霸权政治推向全球空间治理，造成各国交往中存在着不平等的空间关系，全球治理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长期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在权力逻辑主导下建构的全球空间秩序和空间格局中，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丧失话语权，还遭受发达国家空间剥削和空间压迫，不平等的空间关系也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为此，要大力推进新型全球空间政治关系的构建，推动世界各国平等地参与全球空间治理。

首先，着力提升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空间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公正的国际制度规约资本和霸权逻辑在全球空间生产中的作用。世界各国是全球空间的构成部分，也是全球空间治理的主体，因而全球空间治理的制度需要由各国在共商中共建，不能沦为某些发达国家的权力工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以公平正义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国际治理，而只有保证共同体成员公平参与国际治理的基本权利，这种共同体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26]。为此，就必须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和制度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公正规则来制约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本性，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经济促动因素的作用，利用资本的活性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树立自觉意识，用制度来规范资本逻辑的演绎和发挥，抑制其危害性^[27]。公正国际规则的制定，就是要规范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来为贫穷落后国

家的空间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也需要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和制度的制定，提升贫穷落后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其次，建设全球范围政治平等的对话平台和协商机制，解除发达国家在全球空间政治中推行的霸权逻辑，促进新型全球空间治理观的形成。在现有的全球空间格局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积累和技术优势掌握着全球空间政治交往中的话语权，推行着其霸权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摆脱这种话语强权和霸权逻辑，促进各国在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中参与全球政治，这种对话平台和协商机制的构建不仅需要中国的倡导和引领，更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可以为其提供建设性的中国方案，如建立相关国际机构促进平等对话，为共同协调提供相应的对话平台、组织机构，甚至是部分资金。在此基础上，促进各国形成共商共建共赢的全球空间治理观，平等有序地参与全球空间治理，推动各国之间形成民心相通、民意相连的现实共同体。再次，要发挥现有国际机构在维护全球空间正义中的作用，通过既有机构相关制度的调整 and 平台搭建功能来实现国家政治主体平等地参与全球空间治理。如发挥联合国在维护平等国际关系、消解全球空间生产霸权逻辑中的积极作用，把它打造成各国沟通、交流、对话的平台和机构，为公正的全球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平等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贡献力量。

（三）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奠定全球空间正义的思想基础

资本主义现代性预设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非彼即此的思维，这也造成了在资本向全球空间扩张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总是寻求通过剥削和压迫他国人民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增殖与循环，而不是探索合作共赢的道路。为此，必须要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价值自觉，从而自觉抛弃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剥削和空间压迫，为构建全球空间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思想基础和意识自觉。

首先，在各国的实践交往中培育各国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各国人民自觉参与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中。作为全球空间场域的共有者和享用者，各国人民理应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and 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分认识到当前世界人民之间命运相连、发展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摒弃现代性逻辑下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实践交往中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这种意识和自觉是在各国政府有意识引导下，各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交往中自觉形成的，在交往中形成的命运相连、空间相依、未来与共的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最质朴的思想基础。其次，要凝练和打造符合各国人民价值共识的共同价值，并以此为价值共识基础，推进全球正义事业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基于自身标准而提出的价值标准，并非世界人民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基于尊重民族性和文明“个性”基础上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6]这是在尊重个性特征和差异基础上人类社会的价值共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精神纽带。同时，要为“共同价值”的凝练和打造供给“中国营养”和“中国贡献”。当代中国价值观展现了当代中国人民的良好精神追求和价值风貌，要通过传播这些价值观念来展现中国人民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和真诚意愿，消除可能存在的文化误解、价值偏见，增强世界人民与我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支持，进一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营建正义的全球空间的价值诉求。当然，在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时要采取多重措施，“包括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和学术交往中的价值观念传播与寄载”，落实到具体路径则包括“媒介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利用传播活载体等进行价值观念的负载与传播”^[28]。进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练具有价值包容性的价值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价值基础，为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创造思想条件。再次，构建各国关于全球空间生态治理的问题共识，以生态危机意识的自觉形成助力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气候问题已经不断蔓延至全球空间领域，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承担着发达国家不计后果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恶果，遭受着生态不正义。

另一方面，全球空间生态问题又不能仅仅依靠任何单个国家、单个民族来解决，只有全人类联起手来共同努力，才有可能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園、最终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因而，每一个“地球村”的居民都应该树立责任意识，共享地球资源，同担气候责任，在发展中坚持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29]。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别无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以生态危机意识的不断强化为基础，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进而各国家、各民族、每个人都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空间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维护全球空间的生态正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19(002).
- [2] 林青.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的兴起[J]. 天津社会科学, 2013(3).
- [3] 任政. 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6).
- [4] 任平. 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 城市发展研究, 2006(5).
- [5] 曹现强, 张福磊. 空间正义: 形成、内涵及意义[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4).
- [6]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 2015-09-29(002).
- [7] 卢德友. “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时代性观照下理想社会的现实探索[J]. 求实, 2014(8).
- [8] 习近平.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N]. 人民日报, 2013-09-06(002).
- [9]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桑建泉, 陈锡喜.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关系新论[J]. 青海社会科学, 2017(6).
- [12]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3]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李春敏. 资本积累的全球化与空间的生产[J]. 教学与研究, 2010(6).
- [17] [英]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8] [美]大卫·哈维. 资本的空间[M]. 王志弘, 等, 译. 台北: 群学出版社, 2010.
- [19] 赵斌. 全球气候政治的碎片化: 一种制度结构[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 [20] 孟献丽, 左路平. 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戴维·佩珀生态正义思想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 2017(1).
- [21] 毛勒堂. “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基于资本逻辑语境的阐释[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1).
- [22] 刘洋.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11).
- [23] 田鹏颖.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1).
- [24] 武彦斌. 跨越发展陷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路探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 [25] 左路平, 赵爱霞. 《共产党宣言》蕴涵的全球空间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 [26] 刘方平.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4).
- [27] 陶富源.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规范资本逻辑[J]. 哲学动态, 2018(4).
- [28] 左路平, 吴学琴.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J]. 探索, 2018(1).
- [29] 徐保风, 张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球气候公正理念的构建[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Towards Global Space Justice: Spatial Im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ZUO Lu-pi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 of space justice, Marx's thought of space justice was uncovered.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prominence of the problem of global space justice, which demonstrates its strong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human feeling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justice becomes its value pursuit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lobal space injustice is manifested as follows: in the illusory community of human beings, capital expands to global space; political power intervenes in global space production; global space presents unbalance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global space problems such as climate, resource plunder and pollution transfer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global space justice, promote the shared development among countries, change the unbalance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space,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a just system, realize equal participation of all countries in global space governance,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rough consensus on values, climat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lay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global space justice.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global space justice; spatial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